

红四方面军入川记 13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政府拨给四川军阀200万发子弹。蒋介石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由，命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由甘肃入川，接管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防务；令上官云相指挥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万源地区推进。全川“防匪剿赤”事宜，均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并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督战。

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迅速增至200个团以上，采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方法，在根据地周围层层修筑碉堡，严密封锁，意图实现“南拒北攻”。即南面扼守长江防线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北面猛攻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防止其与中央红军会合。为贯彻清江渡军事会议确定的“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趁敌“川陕会剿”尚未就绪之际，主动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敌方精心策划的“川陕会剿”终成泡影。



昭化区昭化镇广昭战役凉亭子战斗遗址。

文/图 冉奎

“川陕会剿”的破灭

■广昭战役

广昭战役凉亭子战斗遗址位于昭化区昭化镇战胜村牛头山麓五里垭，地处天险英雄其上、嘉陵江蜿蜒其下的古驿道要冲。作为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昭化地区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战场，凉亭子战斗旨在夺取两城并扩大苏区。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指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后方机关转移至南江旺苍坝（今旺苍县）地区。

1935年1月4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东线敌刘湘六十个团于绥定、宣汉、城口地区；南线李其相、罗泽洲、杨森等三十个团于营山、仪陇地区；西线田頌尧、邓锡侯及胡宗南之丁德隆旅于阆中、昭化、剑阁、广元地区……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电报内容主要是报告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周敌情，也透露出撤离川陕另辟根据地的意图。

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20日，由毛泽东参与的新中革军委拟定《关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此时，从鄂豫皖出发长征的红25军已进至陕西蓝田、山阳、商县等地。

中央红军需要策应，红25军也需要接应，派兵少了有可能有去无回，派兵多了根据地又难守，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讨论半天没有结果。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确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谋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25军。”

与红四方面军的交战中屡处下风，而广昭战役则加速了四川地方势力向南京政府靠拢的进程。

■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新铺湾战斗遗址位于陕西省勉县新铺镇川陕公路沿线，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的关键战场。红军运用夜战、迂回战术攻占蜂子岭等要地，切断敌军通信，最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及独立旅一团，缴获大量装备。此战为后续攻克勉县、褒城奠定基础，并扩大根据地版图。

1935年1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收缩东线，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

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有敌重兵把守，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有剑门之险，在何处渡江和用何工具渡江是个问题。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33军军长王维舟带领参谋人员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确定渡口，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则负责造船。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以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策应已进入陕南商县（今陕西省商州区）一带的红25军。陕南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曾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即“汉中密约”。红军出击前派人送信给孙蔚如（今陕西省宁强县）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劝他主动撤兵不要抵抗，但杨竹荪却令部队坚守，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陕南战役主战场在宁羌、沔县（今勉县）、褒城（1958年撤销，划归勉县、汉中市、留坝县和南郑区）和南郑四地。2月3日，陕南战役开始。红4军10师主力和12师一部攻击宁羌外固阵地东山观，次日克城，全歼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部及2个营。红12师一部攻克阳平关，歼敌二团另一营。5日，红4军、9军、30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一旅一团经沔县在新铺湾阻击。8日拂晓，红4军一部发起攻击，激战半日形成对峙。9日，红4军10师和红30军88师实施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断敌沔县退路，歼敌大部，乘胜攻克沔县，在武侯祠设立指挥部，指挥围攻褒城、南郑的战斗。

2月14日，红4军、9军、30军、31军各一部及教导师主力和游击队约3万人，向南郑县城进击。18日，红军兵临南郑城下。19日，红30军主力及教导师、地方游击队合力攻打南郑城西关、南关，红33军296团配合作战，敌我双方白刃格斗，进退拉锯10余次。

早在1934年12月，红33军296团据守牛头岭（今陕西省南郑区红庙镇高坝村），防御汉中国民党军队对川陕苏区的进攻，首先向驻红庙塘、喜神坝的国民党部队出击，消灭敌100余人。1935年1月6日，国民党三十八军重营王云山部向喜神坝构筑工事，企图堵剿红军。19日，红296团兵分三路攻取正面和左、右翼山头，互有伤亡。2月6日，红296团同红4军一部再次进攻喜神坝、红庙敌军，迫使敌人后撤。敌军以为红军要从陕南北出，立即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待胡宗南部回调甘南、邓锡侯部接防广元后，红四方面军投入战役目标已达到，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

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陕南战役自2月3日至22日，历时20天。红军共歼敌4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

■汉中密约

在木门会议酝酿之际，一场秘密谈判在陕南汉中悄然达成，这便是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的“汉中密约”。该密约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围困消灭于川北的封锁计划，对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汉中属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俗称陕军）的防区。1932年12月，蒋介石预料红四方面军在围攻下将西进关中、转往甘肃，因而提前将杨虎城的主力第三十八军调往甘肃天水，并将汉中防区交由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接管，然而红军却转向川北发展。1933年2月，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又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部换防，使得杨虎城的陕军被迫处于与四军军阀合力“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前沿。

杨虎城不愿被动陷入内战泥潭，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在第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受中央特科指示，通过高级参议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秘密联系红军，互不侵犯”的建议。杨虎城最终采纳此议，决定派武志平作为密使前往红军根据地联络。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自汉中奔赴通江。

1933年5月22日，武志平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表明来意，并拿出密信、密电码及川陕甘三省部分军用地图。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战役的徐向前得知杨虎城部的特使送来地图，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回电告知地图已收到，并嘱咐妥善接待来使。这是红四方面军首次获得的大型军用地图，徐向前视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

随后，红四方面军派遣曾留学苏联的川陕省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返回汉中，与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高级参议王宗山进行谈判。1933年6月1日，双方达成以“共同反蒋抗日”为宗旨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为防止泄密，该协定未形成书面文件，仅作口头约定。

此后，一条从西安经汉至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通江的“红色交通线”正式建立。据武志平回忆，该线路主要承担三项任务：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传递敌军情报；协助采购与转运物资；掩护革命同志进出根据地。廖承志、潘自力等重要干部即经此线安全进入川陕根据地。

“红色交通线”有效打破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与军事封锁，武器、弹药、通信器材、药品等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极大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武志平提供的密电码，也为红四方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讯、掌握敌情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佩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写道：“红四方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讯密码，是因为西北陕军的孙蔚如派武志平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电码底本，这对我们破译敌军的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中密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前后持续约两年。在此期间，“巴山南麓无战事”，既缓解了杨虎城部的生存压力，也使红四方面军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为实现共同抗日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代“铁面御史”李漱芳

□罗学闻

我曾去渠县合力镇园峰村探访，着眼点是“李漱芳故居”，缅怀清代乾隆朝“铁面御史”李漱芳。

来到李家中院，矗立着一组沉默的石头建筑，当地人称之为“李家桅杆”。据说，“李家桅杆”原有六根（门前四根、山坡上两根），呈等腰梯形排列。如今，在“李漱芳故居”门前，我们看到的是两根石桅杆（另有两根早年已毁）。“李家桅杆”以九点五米的高度刺向苍穹，这不仅仅是一堆冰冷的石头，它们是李姓家族最显赫的“勋章”。清代用石桅杆标示科举功名：秀才底座为四角，举人为六角，唯独进士及第方有资格使用八角底座。在“斗”的使用上，秀才无斗、举人一斗、进士两斗、状元或一品官三斗。据现场查看，“李家桅杆”均是八角底座，符合李漱芳的进士身份。但这些桅杆的“斗”却只有一个，不知其意，只能归为“特例”。李漱芳是渠县唯一在《清史稿》中有传的人，我们随着这些石桅杆，说说乾隆朝著名的“铁面御史”李漱芳及其家族的故事。

家世孤苦：少年磨砺

要理解李漱芳的刚直，必须先读懂孕育他的土壤。据嘉庆《渠县志》记载，明末至清，渠县李氏创造了“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六举人四人受封”的科举神话。这并非虚言，而是一个跨越数代、仕学兼优的庞大文化谱系。

李漱芳的高祖李含乙（字鹤汀），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著有《秦岫集》；曾祖李珪（字公执），是顺治丁酉（1657年）举人，著有《说剑斋集》；曾叔祖李璠（字岩山），是顺治甲午（1654年）举人，著有《片石斋集》；叔祖李桂（字楚材），是康熙辛酉（1681年）举人，著有《濠梁集》。此外，家族中还有李储乙、李秉（主持编纂《渠县志》）、李泳等。这七位著书立说的先贤，被后世誉为“李氏七子”。

出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李漱芳，其童年却充满苦涩。他原名李清芳，取“奕奕清芳”之意。母亲早逝后，作为长子，他不得不挑起抚养幼弟的重担。那是一段锥心刺骨的岁月：“包裹布与巾，中夜再三起；邻媪乞乳足，软嚼糜粥饲。”深夜，幼弟啼哭，乳母无奶可喂，年轻的李漱芳只能自己嚼碎米粥，嘴对嘴地喂给弟弟。安顿好弟弟后，他才能“背灯究经史”，在昏黄的油灯下苦读。

这种“放声口若钳，回泪目溃纸”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他一边嚼着米粥，一边在青灯黄卷里寻找未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4岁的李漱芳进士及第，入京后发现：朝中有一位同名的前辈，他是福建安溪人，乃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之侄。出于尊重，按照以小让大的礼制，他呈请吏部改名为李漱。从川东丘陵到华北平原，那个曾经背着弟弟的布衣少年，转眼间已是身着朝服的六部京官。

铁面直谏：惊朝折翼

改名后的李漱芳，似乎也承接了李光地家族刚直基因。他常言：“御史之设，所以防壅弊，必取特立独行、无所依傍者。”在京期间，他“耿介自处，不妄交一人”，这种近乎孤僻的慎独，让他在浮华的官场中迅速确立了“学优才瞻，崇尚气节”的声誉。人仕不到一年，他便从户部主事擢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真正让李漱芳名震天下的，是一场豪赌式的弹劾。当时，乾隆帝的四女婿、工部尚书福隆安的家奴蓝大，仗势横行市井。巡城御史畏惧权势，视而不见。恰逢李漱芳当晚“巡视中城”，目睹其恶行后，他未有一丝犹豫，当即下令抓捕，并上疏弹劾。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帝对此深为嘉许，“命成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李漱芳因此擢升工部给事中，获誉“铁面御史”。那一刻，他站在了权力的风口浪尖，似乎无所不能。

李漱芳因直言进谏坐“过山车”而跌入谷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爆发了王伦起义。虽然是在号称“盛世”的乾隆中期，这只是个局部骚乱，但对于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大帝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的大清王朝，人口激增导致耕地紧缺、粮价飞涨，流民问题已成为帝国肌体上的暗疮。李漱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事后上了一道奏疏，试图剖析动乱的根源。他直言百姓聚众滋事，实乃“为饥寒所迫”，且近畿一带已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

短短数语，彻底触怒了乾隆皇帝。在帝王的逻辑里，王伦起义是“叛乱”，是“谋逆”，绝不容许解释为“饥寒所迫”。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皇帝治下出现了治理危机，在盛世的面具上撕开一道口子。乾隆先派侍郎高朴、袁守侗等人携李漱芳前往卢沟桥及近畿实地核查，高朴等回报“初无流民”。待起义平定，审讯俘虏时，乾隆又命李漱芳旁听，结果无一承认是“饥寒所迫”，且称当年“秋收尚及半”。乾隆大怒，下谕痛斥：“李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官路，为世道人心害。”

一道圣旨，将“铁面御史”打成了“妄言”之人，并左授为“礼部主事”。

被逐出言路后，李漱芳在京沉浮近三十年。其后，虽然他也曾复职（礼部郎中），但那种“直声播中外”的风采已一去不返。李漱芳心生倦意，适因继母陈氏在籍病故例应丁艰（丁忧），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顺势选择了辞官归乡。

归乡之日，行李萧然。当舟船缓缓驶入渠江码头，早已闻讯赶来的父老乡亲围拢过来，好奇这位“直声播中外”的大官带回了什么金银财宝。箱子打开了，没有绫罗绸缎，没有奇珍异宝，满箱皆是新书。嘉庆《渠县志》记载：“李漱芳在外为官三十年，辞官还乡，所载之物仅一船书。”县志编者忍不住感叹：“清廉真是不一般。”

这让人想起东汉末年东吴的陆绩。陆绩年少时便以“怀橘遗亲”的孝行被载入《二十四孝》。出任东吴后，因性格刚直被外放为郁林太守，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南江村。任满归乡，陆绩身无长物，因行李太轻船不能渡海，特搬巨石压舱，人称“廉石”。一千五百年后，李漱芳以“一船书”压舱，与陆绩之事遥相呼应。书比石头更重，那是知识的重量，更是人格的重量。“一船书”的记载见于《渠县志》，而“置书压舱”的民间传说虽不见于正史，却与“廉石”典故一脉相承，成为清官文化的美好注脚。

诗文遗稿：儒者本色

李漱芳不仅是一位刚直的御史，亦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和诗人。据《晚晴移诗汇·卷八十八》记载，他著有《艺圃诗集》，今国家图书馆有藏。他的诗文作品虽流传不广，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传为其七言绝句的《晚秋江上》意境清新自然，语言简练明快，写景抒情浑然一体，诗云：“淡淡秋江落日斜，水清沙白下寒鸦。渔人撒网携壶去，一路歌声入荻花。”此诗描绘了晚秋江上的美景和渔人的生活，画面感强，意境清幽，展现出一种宁静闲适之美。据文献记载，李漱芳还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工作。《续文献通考》，系乾隆年间敕修的大型典志体史书，承接马端临《文献通考》，纂修者多为朝廷遴选之饱学之士。若此说属实，则说明李漱芳的学识在朝中获得了相当认可。

从“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六举人四人受封”的家学渊源，到李漱芳本人“生而颖异，六经、四书随读能解”的天资禀赋，再到他亲身著述、参与修典，渠县李氏家族的家风正是“行孝善、守气节、重操守、做学问”十二个字。做学问与守气节在李漱芳身上并行不悖，一个是读书人的本分，一个是为官者的底色。归乡数月后，李漱芳一病不起，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53岁。《清史稿》用“学优才瞻，崇尚气节”八个字定论其一生。这八个字，既刻在史册里，也立在渠县合力镇园峰村（清代称万寿里）的“李家桅杆”上。

回望那组石桅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两进士六举人”的科举荣耀，更看到了一个士大夫在皇权与良知之间的艰难跋涉。他是“铁面御史”，曾官至给事中，回乡时却只有“一船书”。在乾隆盛世的华丽帷幕下，一个清官的身影就这样静默登场。历史终究记得他，不是因为他的官做得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骨头有多硬。那八角形的“李家桅杆”，历经两百五十余年的风雨，依然倔强地指向天空，还有那个像“扩音器”的“斗”，仿佛在向上天诉说着那个关于气节与书香的不朽故事，让我们对渠县这个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肃然起敬。